

不断求索的学者

——陈东琪小传

■ 徐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副处长,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

陈东琪,原名陈东奇,湖南省湘潭县良湖公社(现在的云湖桥镇)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20世纪80、90年代先后入选《中国经济学希望之光》、《中国青年新闻人物年鉴》、《当代中国经济学百家》、《中国社会科学家人词典》,“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创始成员。

作为七七级大学生,陈东琪于1981年获原湖南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博士学位。1989-1990年作为特等生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进修,1992-1993年赴美国贝克莱加州大学做博士后课题研究,1988、1992年两度与刘国光、张卓元等专家合作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1996年获国家青年社会科学成果奖,多次获国家部委级科研成果奖,被英国路透社评价为对中国经济政策最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陈东琪先后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因此确立了他在国内经济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1985-87年,他创立的东欧经济学,填补了外国经济学研究的空白,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理论,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研究,促使学术界和决策界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思想来源。1987-88年,他与刘国光、张卓元等学者提出的“稳中求进”思路,为渐进改革和可持续发展、减缓宏观经济波动做出了重大贡献。1989年,他在《新土地所有制》中提出的“土地股份制”,为深化农村土地改革提供了最早构想。1990-92年,他创建的“强波经济理论”,发现市场化改革加快了经济增长,提高了宏观效率,促使周期波动收敛,宏观稳定性更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1994-95年,他与李茂生等学者首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其合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推进了国内经济学研究和创新。1996-99年,他在《微调论》中构建系统的微调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强波经济论》提出的“双向微调”思想,为稳健宏观管理、改善政府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1999-2000年,他在《新政府干预论》中,指出政府作用的局限性,强调必须缩小政府规模,改革政府机构和管理方式,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为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2001年,他在与银温泉等人提出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议。2004-05年,他在《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中,建议政府放弃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实施“双稳健”政策(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促进均衡发展。2008-11年,他在与合著的《繁荣与紧缩——中国2003-07年的宏观调控》、《世界经济危机研究》、《新一轮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思路》等著作中,强调结构性减税,藏富于民,释放市场能量,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2012年,他提出严法明制、公平竞争的新一轮改革思路,指出改革目标是全面构建包容透明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包容和谐、公平高效的现代民主国家。这些理论思想和政策建议,先后被政府采纳,其影响在随后的改革、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逐步显现。

陈东琪多次参加国家中长期规划(计划)起草研究、“3-5-8改革方案”设计(1987)、“政府工作报告”(1999、2009、2010)和中央经济工作文件起草(2009、2010、2012)等。他多次进入中南海参加中央领导主持的重要理论会议,为国家发展改革工作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1991年9-11月,他与刘国光、吴敬琏、张卓元、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经济专家一起参加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主持的11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为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贡献了思想。2002年4月,作为时任总理朱镕基问策的12位经济学家之一,提出“入世”后要积极应对挑战和利用难得的发展机遇,促使企业走出去,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2003-12年,15次参加时任总理温家宝主持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宏观稳定做出了贡献。2005年4月,参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座,建议要利用好黄金发展机遇期,将建设“总体小康”提升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同年7月,与王春正、王梦奎、易纲、余永定等经济专家一起参加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国际问题咨询会,为中国如何提升国际地位建言献策。

一、来自湖南乡村的经济学家

陈东琪农历1955年7月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良湖公社新联大队张家屋场,后跟随父母几度搬迁,在铁子垅(景红组)安居下来,童年、少年和青年的美好时光在家乡度过,家乡的生活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他自小就十分聪颖好学,197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湘潭县三中。高中毕业后,回乡担任生产队会计一年。自1974年4月至1975年8月参加湖南省麻阳县谷达坡段的枝柳铁路(三线)建设,任排宣传员、连队文书。他勤学上进,1975年8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湘潭地区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中文教师,兼职学校团总支副书记。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春风拂来,经过不懈努力,陈东琪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进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教系。起初他酷爱文学,1978年偶然读到《人民日报》的一篇宣传农村联合承包制成功经验、鼓励改革的文章时,他敏锐地意识到:

“中国要发生大变化了,中国改革肯定要搞市场经济,至少要改变计划经济现状,所以,经济学很重要,国家一定迫切需要经济学人才。”

这一超前想法,促使陈东琪在大学二年级转专业,从文学转到经济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经济学教材,包括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小册子,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以及一些解释《资本论》的读物,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和批注,同时开始大胆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和前景,为他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最初且最重要的认知基础。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用人单位求贤若渴,很多同学毕业后直接走上工作岗位,而陈东琪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长远眼光,为了在学术道路上攀登高峰,立志经济学研究,决定大学毕业后直接考硕士研究生。由于勤奋刻苦,坚持不懈,他如愿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系)硕士研究生,1982年2月进北京求学,师从当时国内最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田光教授。

陈东琪读研时期,即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初期。在这快速走过的3年里,他与樊纲、郭树清、顾海良、何家成、李晓西、王振中等同学一起,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理论和外国经济学。通过学习和了解外国经济学,他们系统了解了“二战”后欧美市场经济快速而稳定的发展,系统认识到原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缺陷和弊端,系统掌握了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莘莘学子,他们胸怀科学信念和国家使命,在国内比较早地确立了市场经济认识,确立了中国改革必须走市场化道路的思想。

硕士毕业后,出于对经济学研究的强烈兴趣,陈东琪没有像多数同学那样进入政界,而是留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经济思想研究室工作,继续深入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在经济思想研究室工作期间,作为最早研究比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学者之一,陈东琪系统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独立提出了“东欧经济学”概念,构建了东欧经济学理论体系。1988年出版的《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书,洋溢着创新意愿,既填补了中国“外国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研究的空白,也强化了国内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思维,当时在经济学界影响很大,获1989年全国优秀图书奖。正如刘国光教授在该书“序”中所指出的一样,该书是一部“在改革中求创新、求发展的青年学者的有益之作”,“表现出对我们的改革事业浓厚的关心和寄予极高的期望”。

正是这本书,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使陈东琪能够以“非常熟悉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专家身份,后来有机会直接向中央高层表达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看法,为国家的改革事业贡献智慧。

陈东琪科研究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既出于理论兴趣,更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强烈冲动和责任,以及富国强民的强烈愿望,用他后来的话说:

“我学经济理论,构建东欧经济学体系,从过程中得到了乐趣,但最终目的是为了用经济学理论指导身边的改革和发展实践,指导政策的科学操作,用经济学知识服务于国家。”

基于这个认识,陈东琪后来主动请求调到“国民经济研究室”(现在的宏观经济研究室)工作。这次转室,使他的研究视野发生了很大变化,完成了由内而外、从书本(东欧经济改革理论文献)到实践(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的科研角色转换。

当时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既是新中国经济改革思想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宏观经济学家诞生的摇篮,她聚集了国内顶尖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专家,如杨坚白、刘国光、董辅初、乌家培、戴园晨等学者。在这个精英汇聚的研究室,陈东琪较早进入我国宏观经济学研究最高平台,获得了认识宏观经济运行和长期发展的秘诀和方法,以及对复杂宏观经济现象的敏感感悟和理解。

在宏观经济研究室工作之初,他考取了宏观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中国宏观经济学创始人杨坚白先生,他以突出的学术研究成就于1988年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成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后起之秀,全国宏观经济学界的佼佼者。

为了使青年学者更好地成长,中国社科院将陈东琪列为重点出国培养对象,给他三个出国选择: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数量经济学博士学位;到英国皇家学院作一年访问学者;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到美国进修。20多年后他回顾说:

“当时我想去最先进、最自由的地方学习,去看看最发达的市场经济,结果去了美国。”

1989年“六四”前,他到了美国,先在博德爾经济学院强化英语,然后以特等生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师从本杰明·弗里德曼教授,进修货币金融理论。按照当时美国的法律,“六四”之前和之中进入美国的中国学生,可以获得保护身份并可随之拿到绿卡,当时和他同住剑桥区一位研究朝鲜族历史的台湾史学家,建议他留在美国做一个自由人,但陈东琪以湖南人强烈的爱国特质回答说:

“我愿意也有能力为国家服务,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布什政府打工”。

这个看准了目标就不回头的湖南人,毅然决然放弃在美国发展的机会,准时回国继续他的经济研究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让美国只少了一个可能最多属于普通级的异族公民,却让中国多了一个经常进入中南海建言献策的本族经济学家。

一个人的诚信是要一点一滴来积累的,而每一次诚信积累都会带来回报。陈东琪放弃美国绿卡诱惑,准时回国工作,赢得了祖国的信赖,使他有更多机会去美国。时隔两年,1992-1993年,他又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健康保险基金的博士后课题研究。两次去美国学习,使他深切感受到市场的力量,感受到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陈教授告诉我,他读完小和中学时,经常在周末早晨去离家很近的楠竹山镇卖菜、卖鸡蛋,将所得不多的钱买一些盐、肉和其他日用品,早期的市场交易经验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心和脑。而两次美国学习,将这些原始的市场意识激发出来。正是这种原始的市场意识、研究东欧市场化改革的心得和美国现代市场经济的体验三者碰撞,使陈东琪教授在后来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始终恪守“从马克思、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和发展理念。正是这种不离不弃的市场信念支持,陈教授才得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出道较早的知名中青年经济学家。

中国从1978年拉开改革开放大幕的那一刻起,就需要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不断提供推动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思想,就需要不断提供有用且可操作的发展政策建议。而作为理论思想和政策建议的提供者之一,陈东琪也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获得了回报:

1988年,破格晋升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988-92年,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1992年开始终身享受国务特殊津贴;

1993年晋升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94年成为当时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1993-94年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科片(现在的学部)学术秘书(副局级干部);

1995-99年担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1997年,获中国社科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7年获国家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中“千”人才称号;

1999-2002年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2002-03年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2003年以来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这些职称、职务的变化,虽然没有令时下国人为之追捧的高官光环,但是闪烁着让后学者为之称羨的学术成色!

二、为改革鼓与呼,为政府勤于课

1、比较社会经济制度,勇于挑战传统理论

1984年底,陈东琪开始经济学研究的职业生涯,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经济思想研究室,重点研究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急需解放思想,急需引进新的经济理念,急需学习借鉴国外的市场化改革理论,而研究比较经济制度是一条重要途径。当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为数不多,影响较大的团队有以中央编译局为平台的吴敬琏、荣敬本、郭树清等学者,有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为平台的赵人伟、陈东琪、崔之元等学者。

在比较经济制度研究过程中,陈东琪独辟蹊径,从上世纪50-60年代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中提炼出“东欧经济学”,在《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1988)一书中,首次构建了东欧经济学理论体系。这项研究成果,既改变了以往“外国经济学”只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丰富了



● 陈东琪

“外国经济学”的内容,也为改革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本可集中寻找的思想来源。

陈东琪在该书“后记”中说:

“1982年秋,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偶尔看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另一本是布鲁斯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很快,我对这两本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我又相继读了锡克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的市场》,卡德尔的《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和锡克的《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等书。我在读这些书时,我国经济界正在热烈讨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构问题。当时,我感到,我们的讨论,视野不够开阔,各家之说似乎都有点‘闭门造车’的味道。因为到那时为止,西方经济学只是被当作‘学科知识’来介绍、讲授和研究,不大承认它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可用性。经济学家们一方面拿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论合作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些新范畴,构筑一个新体系。我发现,这恰恰漏掉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这就是近30多年来伴随改革而获得极大发展的‘东欧经济学’。因此,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收集有关‘东欧经济学’的材料,并逐步产生了对‘东欧经济学’进行综合概括和描述的想法,且决意写一本题为《东欧经济学概论》的书。”

上世纪30年代,以哈耶克、米塞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和以兰格为代表的东欧经济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陈东琪完全被论战双方所吸引,甚至对双方都很敬佩。他的内心深处,既被哈耶克、米塞斯的自由精神所冲击、所振奋,更被兰格的社会主义改革精神所感染、所刺激,因而获得强烈的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从长远来说,一定要走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这个认识,体现在他的《东欧经济学概论》全书中。在当时计划经济思维盛行、“食洋不化”被一批批判的氛围下,不可能直接从哈耶克“自由市场经济”的提法,但他对“自由”和“市场”持明显肯定的态度。从该书的章节内容、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自由”和“市场”本身没有错,就如同“社会主义”和“计划”本身没有错一样,错就错在将“社会主义”、“计划”与“自由”、“市场”对立起来,陈东琪主张“二者结合”。在陈东琪看来,就如中国西方国家存在“市场失灵”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政府(计划)失灵”,因为政府(计划)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他赞同通过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所指出的“分权化”改革,走捷克经济学家锡克的“第三条道路”,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轨到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雷瓦特所设计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

在研究过程中,陈东琪受东欧经济学的影响很大,强化了市场经济思维,随后陆续发表了挑战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提出了市场化改革思路和建议。这些观点、思路和建议,从理论史上看都是比较早的。直到1985、1986年,主流理论仍把通货膨胀和失业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存在这两种现象,但陈东琪在中

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出版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内刊)和《经济学动态》等刊物中,连续发文提出通货膨胀和失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并认为这两个现象对效率来说是必然的、必要的,我们不能人为地取消,他据此提出“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的改革思路。这些观点,今天来看属于常识,简单明了,但在近30年以前,提出这样的观点是要冒风险的,要有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和勇气,因此具有理论开拓和创新的意义。

从1985年到1988年的研究活动和成果看,陈东琪一方面宣传东欧经济改革理论,一方面形成市场化改革思路并将其变成行动引导。和那时活跃在经济学界,如华生、何家成、边勇状、张学军、周其仁、张维迎等青年学者一样,他不断发表文章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一定要走市场化道路。后来,他和樊纲、李晓西、王振中等同学,成立了市场化改革研究小组,提出的市场化改革思路直接影响到高层。陈东琪在我写作本《传记》时告诉我: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鸟笼子’观点盛行,经济学界主流偏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市场化’被当作‘全盘西化’,我们在那时提出‘市场化改革思路’是有理论风险的。”

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要改变实际已被乌托邦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优越性”观念,突破计划经济思维定势,营造市场环境,需要进行持续时间较长的艰苦探索,需要进行反复的争论和解释。

上世纪80年代,以陈东琪为代表的青年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老师们,做了许多影响后来成名的经济学家和改革决策者思维的开拓工作,为中国走市场化道路起到了促进思想解放和新社会主义理论传播的作用。

人类思想的进步和发展,就像一串长长的链条,每一环只是短短的一段,但是这个链条离不开每一环。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思想,既直接推动了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也为此后深化改革提供了现在来看仍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来源。陈东琪和他的同时代青年学者,以及富有远见卓识的老一辈改革理论家,是那个改革时代的弄潮儿、探路者。

1991年9月至11月,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亲自审定专家名单,在北京主持召开了11次理论座谈会,讨论关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会上,陈东琪与刘国光、吴敬琏、张卓元、蒋一苇、李宗、王慧炯、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经济学家一起,多次发言讨论了“市场社会主义体制”的提法,指出国家走市场化道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的战略意义。最新出版的《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对这11次会的评价做了如下概括:

“11次座谈会比较充分地讨论和酝酿了我国经济体制选择和改革目标,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说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具有的基础性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为江泽民同志1992年6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素材。” (下转 03 版)